

偶開天眼覷紅塵，可憐身是眼中人

——黃凡的小說及其時代

文／陳澧州

日期：2004年10月9日

對談人：呂正惠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）

黃凡（小說家）

談及台灣文學中的政治小說，決不會遺漏掉黃凡的作品。從一九七九年的〈賴索〉榮獲時報文學獎首獎以來，黃凡就創下聯合文學獎與時報文學獎首獎得獎次數最多的記錄，對於現代人心理以及處境刻劃深入。早期作品為反映當前政治社會問題相關的政治小說，九〇年代初期寫作風格略有改變，呈現後現代的遊戲文本。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《躁鬱的國家》之前，黃凡已經沉寂、暫時離開文壇十二年之久。這段期間內，黃凡是否思考些什麼？理工背景出身的他，又是如何踏入文壇的？

■步入文壇

希冀能以小說創作、投稿文學獎來謀生而踏入文壇的黃凡，否認所謂「得獎專家」的稱謂。當時，他拋棄在麥芽糖工廠的生產主任一職，專心地創作，無非是豐厚的獎金可供生活，也更將生活與寫作網綁在一起了，因而如黃凡所言，他更能超然於黨派與政治之外，其作品每每能深刻地表現社會現實、直指問題核心。其以一九八三年〈傷心城〉、一九八四年〈反對者〉兩篇小說參加「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」，皆以第一名落選。

談到這裡，對於那些不懂其作品的評論者，黃凡只有引用哈代的話來回應：「一部長篇小說如果使一打傻瓜受到致命傷，而對於正常的心智是一帖興奮劑，它就有存在的理由；而且即使心地最純潔的作者，寫出來的小說若遇到一個道德上不

健全的人，也許照樣能夠傷害他。」在作家生涯裡，黃凡表示遭遇到很多的暗算，然而他還是繼續依自己的創作態度去面對，筆鋒犀利依舊。

■與批評家的緊張關係

呂正惠認為黃凡、張大春等引領後現代小說進入台灣文壇；關於這點，黃凡駁斥其說法，並且講述著與批評家一直存在的緊張關係。對他而言，不接觸文學批評、理論，是繼續創作不至於束縛的基本原則。〈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〉這篇小說，當初是他對於電視上「雙向溝通」、多元化方式可否應用於文學上，以及跟朋友誇下豪語之後所做的嘗試，對黃凡來說，寫實批判的題材寫得多了，便寫就一篇遊戲之作。他對於評論家以後來的成果來進行理論的評述，頗不以為然；他認為文學的思潮是很偶然的，對於用「後現代小說」、「後設小說」來稱這篇小說，更顯出是評論家的胡亂猜測。對於評論家評析他的作品，因為處於緊張關係，所以對評論都抱持著不理會的態度。不過，他對於評論的看法是：「說我好話就是好評論，說我壞話就是壞評論。」

■封筆十二年

自一九九一年短篇小說集《冰淇淋》之後，黃凡徹底退出文壇有十二年之久，走向研究佛學、禪學的道路。在那段參禪、修行的日子裡，卻老是無法靜下心來，因為外面的社會讓他無法繼續抱持沉

靜，由於自身的正義感、叛逆的個性，他結集出版了《躁鬱的國家》、《大學之賊》，對於當前現實社會的種種現象與問題，提出批判與諷刺。在創作《大學之賊》時，裡頭哲學系教授的這個角色，必須要有專業的形而上學的素養，而十年來的研究與體悟，黃凡更能得心應手的發揮。譬如在該書的整整二十章裡，每一章皆用一個禪宗公案來談，而且動輒一兩萬字的篇幅，更顯示出黃凡這些年來的學習心得。

最近推出的小說末尾，人民到最後大多發瘋、坐牢，黃凡小說中的虛構角色，是否沒有其他出路呢？黃凡認為，一定要有絕望的感覺，如此一來，人們才會有志氣，也才能去改變社會現況。透過作品，黃凡想要表達的是，這樣的人、這種社會的荒謬性，然而我們卻又覺得很好，這才是最荒謬的事；也唯有透過小說創作，讓讀者們在黑色幽默的文字情節中，去省思社會現象與問題之所在，這些都值得我們回過頭來重新看待。

在呂正惠口中「台灣文學有點沒落」的時候，往年一度負有名氣，針貶社會起著作家良知、擅於刻劃人物心理層面，再度出發的黃凡，他的懷才不遇，也反映出其創作生命到了怎樣的瓶頸，是他的創作不再為這世代所喜愛？還是他的創作泉源枯竭？對談中，沒有進行深入的討論。接下來的黃凡，又將對哪種社會現象進行無情的批評與嘲弄呢？讀者們都在靜待佳音。

51

